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仲呈祥

“要真正落实好‘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就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文艺、主旋律与多样化、重大题材与一般题材、英雄伟人与人民群众的辩证统一关系,就必须在哲学层面、思维方式上来一次彻底的深刻的变革——用全面把握、辩证和谐的科学思维去取代那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

《范仲淹》等“苏派传记片”,四川的从《死水微澜》到《南行记》《淘金记》《壮士出川》等“巴蜀派电视剧”……这些作品走向全国,才形成了中国荧屏的繁花似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理应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去总结好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经验,把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经验提升为中国影视艺术理论,从而赓续党领导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优良传统,谱写好新时代影视艺术的华彩新篇,以开放的博大胸怀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文艺理论和创作经验是必需的,但毋庸讳言的是,时下确实有一种不是像鲁迅先生倡导的那样“运用眼光”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东西为我所用,而是生吞活剥地“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的不正之风。比如,喜欢套用西方文艺理论中的诸如“类型片”“类型片杂糅”“好莱坞大片经验”之类的类型电影观念来误读和阐释中国当今的影视作品,结果是背离了党领导的中国影视艺术的上述优良传统,背离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出现了一部“谍战片”火了,全国竞相效尤,一部“言情剧”火了,到处都是“婚外情”……甚至出现了盲目地拿创作与“好莱坞”对标现象了!凡此种种,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吗?

而且,赓续党领导的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优良传统,就必须弘扬时代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影视艺术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就既需要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伟人英雄,又需要表现一般题材和寻常百姓。须知,我们既主张题材有差别论又反对题材决定论。因为,再重大的题材在平庸的创作者那里也会写得公式化

概念化,以致如茅盾先生所批评的那样,作家艺术家糟蹋了题材,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反之,即使是很小的题材,在高明的作家艺术家那里,也可能开掘出反映时代精神的大主题,如大家熟知的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从“我”与人力车夫对被撞倒的老妇人的不同态度中“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开掘出上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向工农大众学习的时代大主题。可以说,弘扬主旋律与坚持多样化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与此相联系,赓续党领导的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优良传统,在为伟人画像、为英雄立传的同时,作家艺术家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镜头更多地聚焦于耕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第一线的平凡劳动者,如电视剧《人世间》《大山的女儿》《富春山居图》和电影《守岛人》《长沙夜生活》等。我们的前辈、著名文艺理论家秦兆阳曾力倡“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其要义之一便在于强调现实主义创作在题材选择和人物塑造上都须有广度、深度、力度与温度。另一位前辈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则提出了现实主义创作应在写好“英雄典型”与“反面人物”的同时,注重写好大量的“中间人物”即“芸芸众生”,这才是现实主义的“深化”。我以为,这些都是从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中总结出的中国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曾遭受过不公正、不科学的批判,实践却雄辩证明了,在今天这些都应成为我们总结好新时代文艺创作经验之“中国道理”的题中之义。

总之,哲学管总。我以为,要真正落实好“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就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文艺、主旋律与多样化、重大题材与一般题材、英雄伟人与人民群众的辩证统一关系,就必须在哲学层面、思维方式上来一次彻底的深刻的变革——用全面把握、辩证和谐的科学思维去取代那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子夜》的史诗性品格及影响

——纪念《子夜》出版90周年

□王卫平

小说作序,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弱点:缺乏宏观把握生活的气势。

茅盾写《读〈倪焕之〉》,也正是他写《虹》的时候,从《虹》可以看出某些史诗性的苗头,但真正的史诗性的长篇是《子夜》。《子夜》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史诗性长篇小说的诞生,它超越了“五四”文学的“小情主义”“感伤的情调”“情绪的传达”“即兴小说”等“青年文学性质”,第一次使小说具有了整体性、全景性以及宏大叙事。它具有笔力雄健、浓墨重彩、汪洋恣肆等史诗性的品格。《子夜》题材的广阔性、结构的宏大性、主题的多义性、人物的众多性、线索的繁复性,形成了气势阔大的“史诗传统”。茅盾曾说:“我喜欢规模宏大、文笔恣肆绚烂的作品。”这种作品正是史诗性的作品。他以锐利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缜密的构思,驾驭纷纭复杂的时代风云,完成民族国家叙事,回答时代命题。《子夜》以人物为中心,把人物及其命运放在时代的浪潮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吴荪甫具有英雄气质,是一位失败的英雄。茅盾写吴荪甫,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他放在各种社会关系网中。同时,《子夜》属于“浓缩型”史诗性长篇,篇幅并不很长,时间跨度比较小,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但空间幅度大,展现的是时代、社会和生活的横断面,具有概括力,多层次、多线索、全景式,充分显示了茅盾驾驭全局、分析社会的能力,具有社会科学家的素质。

对史诗性品格的继承和发展

《子夜》作为史诗性的长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现当代史诗性作品的先河。严家炎认为:“《子夜》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以相当宏大的规模描绘了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第一次以相当可观的深度刻画了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的典型形象。”“《子夜》是‘五四’以来第一部真正具有宏大而复杂的现代结构的长篇小说。”严家炎在研究中发现,《子夜》的出现,影响了吴组缃、沙汀、艾芜等人的小说创作,形成了一个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

除此之外,《子夜》与中国当代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的关系到底怎样?哪些是“影响关系”?哪些是“共性关系”?正如学者杨扬所说,“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问题”。

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受到另一个作家的影响,一部作品是否受到前辈作品的影响,要有确凿的证据,这证据不外乎两方面:一是作家的自述提到或承认这种影响。二是两个作品中存在着可靠的影响的例证,留下了借鉴的痕迹,不能仅凭题材和风格的相似。从这两点出发,我们看到,中国当代具有史诗意味的长篇小说虽然不在少数,但真正受到《子夜》“影响”的追数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姚雪垠的《李自成》和柳青的《创业史》。姚雪垠的《李自成》得到茅盾的阅读、指导、点评和帮助,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两人频繁有书信往来,后结成《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茅盾对史诗性作品的看法以及创作《子夜》的经验不能不对姚雪垠创作《李自成》产生影响。周而复在怀念茅盾的文章《永不陨落巨星》中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茅盾同志的长篇小说,特别是三十年代在上海读到《子夜》,像彗星一般出现在中国文坛,震动了中国文坛,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柳青的《创业史》力图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显然是和《子夜》要回答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及其性质是一脉相承的。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设有“对历史的叙述”一章,列有“‘史诗性’的追求”一节,其中说到“‘史诗性’是当代不少长篇小说作家的追



做人民的学生

作为文学写作者,我们要向同行学习,向身边的人学习。当然,我们更要走向乡村,走向田野,走向企业,走向河山,走向桥梁工地,那里有更广阔的天地,我们还要向更广大的人民学习。

近几年,中国作协推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作家活动周”“文化润疆”等一系列文学活动。在作协的这些文学活动中,我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这个力量推动着我向前行,忙碌而又充实;这些活动又打开了我的思路,想要写的作品越来越多;这些活动通过跨界合作促使文学与现代传播格局接轨,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天地,拓宽了我们文学创作的路子。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学要“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因此,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向人民学习,做人民的学生,把创作同人民群众相联系,把创作同实际生活相联系,这样才能使作品内容充实、丰富、接地气、有底气、有生气。

向人民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朴素的风格;向人民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勃勃的生机;向人民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深厚的底蕴;向人民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精准的风格化的语言。

我们知道,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表现。要想反映深刻的现实生活,表现真实的现实生活,就要抓住生活的主流和本质。这个主流和本质,就体现在人民群众自己身上。

人民的活动在文艺作品中丰富着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也使作品的思想性更为深刻,穿透力更为强烈。因此,向人民学习,是文学创作揭示和反映社会本质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文学创作规律的必然要求。

作家向人民学习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用文学作品培养人民的欣赏水平、启发人民的觉悟、引领人民前进的方向。因此,向人民学习,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学生,理解他们的感情和生活中所蕴含的干净、淳朴、高尚的题材和素材,把从人民那里学来的东西转化为文艺作品,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所接受。

文如其人,言为心声,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语言,包含着他们的思想、情感、心声、诉求、习惯和智慧。真正懂得了人民的语言,就真正懂得了人民,就打开了通往人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大门。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语言的艺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也是作家的一项基本功。

尊重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尊其师则信其道。拜人民为师的先决条件是以谦逊的态度尊重人民和敬畏人民,把人民始终记在心中。作家要“放下架子、倾下身子”,带着诚意,以谦逊的姿态,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听民声、晓民情、聚民意,人民群众才会和你“掏心窝、表真心、诉真情”。

古语有言,“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要做到“好问则裕”,必须要做到“快脚板”“多张嘴”“勤笔头”,善学善问,从人民群众中获取“金句子”“好故事”,只有这样才会“冒火花”“有灵感”。

“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但是我们不能“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指导自身的实践。要发挥书本知识的作用,就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走出书房向人民学习。我们不仅要“身到”还要做到“心至”,人民群众的那些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就是我们作家最原始的素材和故事。这些故事恰恰是作品中的冲突点。在作品中要解决这些冲突,不仅仅使作品更有张力,同时也给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难题提供启发。

通过作家活动周等形式,作家走进学校、社区、机关、企业,虚心向人民学习,真心做人民的学生。作家与读者面对面,使作家保持了对现实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成了生活的在场者,这提高了作家阅读生活的能力。作家深入火热的的生活,到现场去观察、去体验、去发现、去书写,获得精彩的故事,丰富了情感,生动了语言,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和文学素材。

让我们走吧,马上就出发。

【作者系重庆作协副主席,此文为其在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临沂)活动中的发言】

作家只有『放下架子、俯下身子』群众才会和你『掏心窝、诉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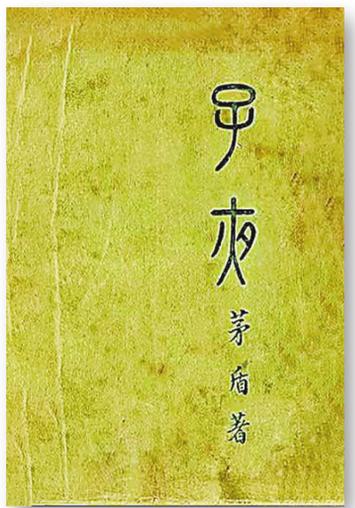
□张者

1933年1月,茅盾的《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至今已90年,《子夜》多方面的成就,值得我们不断纪念。其中,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创立及其之于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意义更是值得大书特书。

《子夜》的史诗性追求

史诗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有过经典论述。它以诗叙史,书写民族的重大事件,充满英雄色彩,因而也叫英雄史诗。由于史诗的结构宏大,气势雄伟,使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和高度评价。因此,这种风格遂向音乐、舞蹈、朗诵、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等领域渗透,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史诗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史诗性的长篇小说由于具有宏阔的视野,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包含着深刻的时代意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因此成为众多小说家的创作追求,甚至是最高境界。

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时期,长篇小说寥若晨星,更谈不上史诗性的作品。那是一个抒情的时代,而非叙事的时代。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批评:“伟大的‘五四’,”“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出来”。“鲁迅而外的作家大都用现代青年生活作为描写的主题了。”“但是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生还是极其小的,局部的。”在这种情况下,叶绍钧的《倪焕之》问世,茅盾欣喜地评价:“《倪焕之》是他的第一个长篇,也是第一次描写了广阔的世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阔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可见,茅盾所赞美的《倪焕之》的史诗意味。同时,茅盾也不满足于《倪焕之》对时代性、社会性的描写,认为书中对“五卅”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正面描写得还不够。同时,《倪焕之》毕竟还是单线叙事,仅仅写一个人的成长和蜕变,缺乏总体性的宏观视野。到1935年,茅盾、鲁迅、郑伯奇分别为第一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三集



《子夜》,茅盾著,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

是人民对“全景展现生活”的新期待。《子夜》已经为我们开创了史诗性作品的良好传统。《子夜》作为史诗性的巨著,它的宏伟的构思、宏大的结构、磅礴的气势、雄健的笔力,以及善于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把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家庭、伦理熔为一炉,体现出“全景小说”的追求,在中国具有开创的意义,且被后代作家所承传。

联系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史诗性、全景式的恢宏巨著还不够多。有一段时期,一些作家有意疏离史诗性,解构“宏大叙事”,片面青睐“私人化写作”,小说内容沉溺于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显出小家子气。新时代以来,长篇小说包括网络小说的创作在全景展现时代、展现生活、展现历史的巨变方面越来越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力图呈现这个时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史诗性,这些都是对《子夜》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和超越。总之,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有“史诗”,史诗性应该成为更多作家、艺术家的企慕和创作追求。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